

数字化赋能“行走的思政课”实践育人机制研究

——基于地方红色资源的视角

汤 洁

淮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淮安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2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9月22日; 发布日期: 2026年9月30日

摘 要

数字化赋能推动地方红色资源开发利用方式、实践教学组织方式和价值塑造方式深刻变革, 为“行走的思政课”实践育人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 也对新时代“大思政课”建设提出了新的理论命题。数字化赋能地方红色资源融入“行走的思政课”, 本质上是资源供给、实践体验、协同育人与价值生成协同演进的实践育人过程。基于教育数字化背景, 从价值逻辑、实践逻辑与技术逻辑阐释数字化赋能实践育人的理论基础, 构建资源转化、情境体验、协同育人、价值生成四维作用机制, 剖析资源开发碎片化、情境体验表层化、主体协同松散化、价值生成浅层化等现实困境, 并提出完善资源供给体系、优化数字实践情境、健全协同运行机制、强化全过程价值引导等优化思路。数字化赋能只有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实现数字技术与实践育人的深度融合, 才能有效释放地方红色资源育人价值, 提升“行走的思政课”实践育人的整体效能。

关键词

地方红色资源, 数字化赋能, 行走的思政课, 实践育人

Digital Empowerment of the Practice-Education Mechanism of “Walk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Based on Local Red Resources

Jie Tang

School of Marxism, Huai'an University, Huai'an Jiangsu

Received: July 22,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22,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30, 2026

Abstract

Digital empowerment has profoundly transformed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local red resources, the organization of practical teaching, and the modes of value cultivation, creating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practice-oriented education of “Walk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while presenting new theoretical proposi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e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in the new era. The integration of digitally empowered local red resources into “Walk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essentially constitutes a practice-oriented educational process characterized by the coordinated evolution of resource transformation, experiential learning,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and value formation.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educational digitalization,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digital empower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value logic, practical logic, and technological logic. It constructs a four-dimensional mechanism encompassing resource transformation, experiential learning,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and value formation, identifies practical challenges including fragmented resource development, superficial experiential learning, weak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nd insufficient value formation,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to improve resource integration, optimize digital learning environments, strengthen collaborative mechanisms, and enhance whole-process value guidance. The study argues that digital empowerment can fully unleash the educational value of local red resources and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Walk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only by adhering to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and promoting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with practice-oriented education.

Keywords

Local Red Resources, Digital Empowerment, Walk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Practice-Oriented Educ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的深入实施和“大思政课”建设的持续推进，为实践育人创新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地方红色资源承载着丰富的革命历史、精神谱系和价值内涵，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实践载体，也是推动“行走的思政课”建设的重要资源基础。随着数字技术深度融入教育教学，地方红色资源开发利用突破了传统实践教学的时空限制，推动实践教学资源供给、组织方式和育人场域不断拓展，为提升实践育人成效创造了新的条件。

围绕地方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已有研究主要从资源价值阐释、开发利用和教育转化等方面展开。相关研究认为，地方红色资源蕴含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和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价值，是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来源[1]。有学者关注地方红色资源如何实现教育转化，围绕课程资源建设、实践基地建设、校地协同以及数字化开发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强调通过资源整合和载体创新推动地方红色资源由文化资源向教育资源、实践资源转变[2]。上述研究为地方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重要基础，但更多侧重于资源开发和价值挖掘，对红色资源进入具体实践教学场域后的作用机制仍需进一步深化。

随着“大思政课”建设的深入推进，“行走的思政课”逐渐成为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改革的重要形式。已有研究指出，“行走的思政课”突破传统课堂的空间边界，将教学活动延伸至社会现实场域，通过现场教学、社会实践和情境体验等方式，引导学生在真实环境中深化理论认知、强化情感体验，实现思政课由知识传授向价值塑造和实践养成拓展[3]。围绕地方特色资源融入“行走的思政课”，相关研究强调依托革命遗址、红色场馆和地方文化资源等实践载体，能够丰富实践教学内容，拓展思政教育空间，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感染力[4]。然而，现有研究主要聚焦实践教学模式创新，对地方红色资源如何借助数字技术进一步融入“行走的思政课”、实现实践育人效能提升的内在机制探讨仍显不足。

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的深入实施，为地方红色资源开发利用和实践育人模式创新提供了新的技术条件。相关研究围绕地方红色资源数字化保护、数字资源建设、数字展示传播以及智慧思政应用等方面展开探索，认为数字技术能够突破传统资源利用的时空限制，促进红色资源整合、传播方式创新和教育应用拓展[5]。有学者指出，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能够通过优化教学场景、丰富学习体验和拓展实践空间，为红色资源融入“大思政课”和高校实践育人提供新的支撑条件[6]。但总体来看，现有数字化研究更多关注资源建设和技术应用，对数字技术如何嵌入“行走的思政课”实践过程，以及如何通过资源转化、情境体验、主体协同和价值生成等环节促进实践育人的作用机制研究仍有待加强。

现有研究为地方红色资源开发利用、“行走的思政课”建设以及数字技术赋能实践育人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但仍存在进一步拓展空间：一方面，地方红色资源与“行走的思政课”的融合研究尚未形成系统化分析，对资源、技术、实践场域之间的互动关系关注不足；另一方面，数字技术赋能实践育人的研究仍偏重应用层面的探索，对其内在运行逻辑和作用机制缺乏深入阐释。基于此，本文立足地方红色资源视角，以数字化赋能为重要支撑，以“行走的思政课”为实践载体，围绕数字技术如何促进地方红色资源向实践育人资源转化这一核心问题，分析数字化赋能“行走的思政课”实践育人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提出优化进路，以期为新时代高校“大思政课”建设和实践育人创新提供理论参考。

2. 数字化赋能“行走的思政课”实践育人的理论逻辑

数字化赋能地方红色资源融入“行走的思政课”，不是数字技术对传统实践教学的简单嵌入，而是在教育数字化背景下，地方红色资源、实践育人理念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过程。地方红色资源提供价值支撑，“行走的思政课”拓展实践空间，数字技术重构实现方式，三者共同构成数字化赋能实践育人的内在逻辑。

2.1. 价值逻辑：地方红色资源契合实践育人的价值追求

实践育人的根本任务在于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深化理论认知、强化价值认同，实现知、情、意、行的有机统一。红色资源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能够为高校立德树人提供源源不断的养分[1]。地方红色资源中蕴含着坚定理想信念、厚植人民情怀、勇于担当奉献等精神品质，是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价值资源。地方红色资源区别于一般文化资源的重要特征，在于其兼具历史真实性、实践生成性和价值引领性。

“大思政课”强调把社会现实作为教材，把实践资源转化为育人资源。地方红色资源依托地方红色资源开展实践教学，有利于推动课堂教学向社会实践延伸，使学生在真实历史情境中接受思想教育，在实践体验中实现价值塑造，为数字化赋能实践育人提供了坚实的价值依托。

2.2. 实践逻辑：“行走的思政课”彰显实践育人的内在要求

实践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鲜明特征，也是新时代“大思政课”建设的重要要求。学校要推动思政小

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有机结合,引导学生在社会实践当中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行走的思政课”突破了传统课堂以知识讲授为主的教学模式,将课堂延伸至革命遗址、纪念馆、博物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社会场域,引导学生通过实地考察、调查访谈、现场教学等方式,将理论学习与社会观察、历史感悟有机结合,实现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相贯通、理论认知与现实体验相统一。实践教学由此从课堂知识的外延拓展,转变为学生主动参与、主动体验、主动建构的学习过程。

然而,受实践资源分布、组织成本和教学方式等因素影响,传统“行走的思政课”仍存在实践机会有限、资源利用不足、学习连续性不强等现实制约,实践育人的优势尚未得到充分发挥。这也决定了新时代“行走的思政课”需要借助数字化手段优化实践教学组织方式,不断拓展实践育人的广度与深度。

2.3. 技术逻辑：数字化拓展实践育人的实现方式

数字化赋能的价值并不在于技术应用本身,而在于通过数字技术重构实践育人的资源开发方式、教学组织方式和学习交互方式,为地方红色资源融入“行走的思政课”提供新的实现条件。从资源开发来看,数字技术推动地方红色资源由实体保存向数字化开发转变,能够使红色资源走出固定场所,形成交互性强、体验感好的虚拟育人场景[5],从而突破传统实践教学受时间、空间和地域限制的约束,提高了资源开发利用的覆盖范围和共享效率;从教学组织来看,数字平台促进课堂教学、实践教学以及校内外资源的有效衔接,为实践教学全过程组织和管理提供了有力支撑;从学习方式来看,数字技术强化了学习主体之间的互动交流,推动学生由知识接受者逐步转变为实践参与者和主动建构者,进一步提升了实践学习的开放性、参与性和持续性。

数字技术的优势并不会自然转化为实践育人成效,只有遵循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数字技术深度融入地方红色资源开发利用和“行走的思政课”建设全过程,才能真正发挥数字化赋能实践育人的作用。数字技术不仅拓展了实践育人的实现方式,也推动了地方红色资源开发利用方式、实践教学组织方式和价值引导方式的整体变革,为数字化赋能“行走的思政课”实践育人作用机制的形成提供了现实基础。

3. 数字化赋能“行走的思政课”实践育人的作用机制

数字化赋能“行走的思政课”实践育人,并非数字技术在实践教学中的简单应用,而是依托数字技术推动地方红色资源开发利用、实践教学组织方式和价值引导方式协同变革的动态过程。从实践育人的运行逻辑来看,数字化并不直接产生育人成效,而是通过重构资源供给方式、优化实践体验过程、强化多元主体协同和促进价值认同生成,不断提升实践育人的整体效能。因此,数字化赋能“行走的思政课”实践育人主要通过资源转化、情境体验、协同育人和价值生成四个机制发挥作用,四者相互衔接、层层递进,共同构成数字化赋能实践育人的内在运行体系。

3.1. 资源转化机制：推动地方红色资源向实践育人资源转化

资源转化机制是数字化赋能实践育人的起始环节,其核心在于推动地方红色资源由文化资源向实践育人资源转化。地方红色资源只有经过教育化开发和课程化重构,才能真正进入实践教学过程并发挥育人功能。

数字技术改变了地方红色资源的开发利用方式。依托数字采集、数据整合、数字存储等技术手段,革命文物、历史档案、口述史料、红色遗址等资源得以系统整理,实现资源信息的数字化保存和规范化、数字化管理,为实践教学提供更加稳定、开放的资源供给。同时,数字技术突破了传统资源开发受地域、时间和载体限制的约束,增强了地方红色资源的共享性和可获得性,拓展了实践教学的资源边界。以江苏淮

安红色资源数字化建设为例,依托红色教育资源,通过数字展示、线上展陈、历史资料整合等方式,将革命历史、人物事迹和精神内涵转化为可传播、可体验、可教学的数字资源,推动红色文化资源由静态展示向动态育人转变。这一过程体现了数字化赋能并非简单实现资源“上线”,而是在教育目标引导下完成资源筛选、内容组织和教学转化。

因此,资源转化机制的关键并不在于资源数字化本身,而在于教育化转化。围绕实践育人目标,将地方红色资源按照课程主题、实践任务和学习需求进行整合开发,形成课程资源、案例资源和学习资源,使地方红色资源真正融入“行走的思政课”全过程,实现资源开发与实践教学有效衔接。由此,数字化赋能推动地方红色资源由静态保存走向动态利用,由文化资源转化为实践育人资源,为实践育人提供持续稳定的内容支撑。

3.2. 情境体验机制:推动实践体验向价值感悟深化

情境体验机制是数字化赋能实践育人的核心环节,其作用在于依托数字技术重构实践教学情境,引导学习者在沉浸体验中深化理论理解和价值感悟。实践育人的实效不仅取决于实践活动是否开展,更取决于实践体验能否引发思想共鸣和价值认同。

传统实践教学主要依托现场参观、实地讲解等形式开展,学生虽然能够接触真实历史场景,但由于历史情境难以完整再现,实践体验容易停留于感知层面,理论学习与实践体验之间尚未形成有效贯通。数字技术为实践情境重构提供了新的可能。通过数字叙事、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手段,革命历史事件、英雄人物事迹和地方红色文化能够更加立体、生动地呈现于实践教学之中,增强学习过程的真实性、参与性和互动性。淮安在红色资源开发过程中,依托数字技术打造线上展览、数字场景体验等形式,使学生能够突破现实空间限制,对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形成更加直观的认识,推动学生由“观看历史”走向“理解历史”,由情感触动走向价值认同。

情境体验机制的本质并不在于营造沉浸式场景,而在于促进学习方式转变。依托数字情境组织问题探究、案例分析、交流讨论和实践反思等教学活动,有利于引导学习者在观察、体验、思考和交流过程中深化理论认识,将感性体验逐步提升为理性认知和价值感悟,使实践教学真正实现由“走进现场”向“走进历史、走进思想”的深化。

3.3. 协同育人机制:推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实践育人

协同育人机制是数字化赋能实践育人持续运行的重要保障,其作用在于依托数字平台促进不同主体之间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和协同联动,推动实践育人由单一组织实施向多元协同运行转变。

实践育人涉及资源开发、课程设计、实践组织、教育指导和成果评价等多个环节,仅依靠单一主体难以形成完整的育人体系。数字技术突破了传统实践教学信息传递效率较低、资源共享不足和协同成本较高等限制,为不同主体之间建立稳定协作关系提供了技术支撑。以淮安地方红色资源开发利用为例,通过资源共享、实践教学合作和数字资源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供给、课程教学和实践活动有效衔接。数字平台进一步拓展了协同范围,使资源提供者、教学组织者和学习参与者形成更加稳定的互动关系。依托数字平台,各类实践育人主体能够围绕地方红色资源开发、实践课程建设、教学组织实施和学习成果评价开展深度合作,实现实践资源共享、实践活动联动和育人成果互通。同时,学习者能够借助数字平台参与资源共建、实践交流、成果展示和互动反馈,由实践活动参与者逐步成长为实践育人的共同建设者,不断增强实践参与的主动性和持续性。

协同育人机制通过整合不同主体资源,推动实践育人各环节实现有效衔接,形成资源共建、过程共育、成果共享的协同运行格局,为数字化赋能“行走的思政课”提供稳定的组织保障。

3.4. 价值生成机制：推动实践体验向价值认同转化

价值生成机制是数字化赋能实践育人的最终环节，也是检验实践育人成效的重要体现。实践育人的根本目标在于立德树人，其关键在于推动学习者将实践体验不断转化为价值认同和行动自觉，实现知识学习、思想认同和行为养成的统一。

价值认同不是一次实践活动即可形成，而是在持续学习、不断体验和反复反思过程中逐步生成。数字技术突破了传统实践教学时间和空间相对割裂的局限，将实践准备、现场学习、成果展示和交流反思有机贯通，延伸了实践育人的时间维度和教育链条，为价值生成提供了连续性的学习支持。依托数字平台形成的学习记录、实践反馈和成长档案，能够动态反映学习者的实践参与情况和思想变化，为开展持续性教育引导提供依据。同时，通过实践交流、成果分享、社会服务等多种形式，不断强化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之间的联系，引导学习者深化对革命精神和地方红色文化的理解，逐步形成稳定的价值认同和责任意识。淮安红色资源数字化实践中，通过线上学习、数字展陈和实践活动相结合的方式，推动学生从了解红色历史逐步走向理解革命精神，在持续学习和实践体验中深化价值认同。

价值生成机制建立在资源转化、情境体验和协同育人共同作用的基础之上，是数字化赋能“行走的思政课”实践育人的最终落脚点，也体现了数字技术服务实践育人、促进价值塑造的根本旨归。

4. 数字化赋能“行走的思政课”实践育人的现实困境

数字化赋能为地方红色资源融入“行走的思政课”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但数字技术优势向实践育人成效转化仍受到资源开发、情境建构、主体协同和价值生成等因素制约。当前，数字化赋能实践育人仍存在资源开发碎片化、情境体验表层化、主体协同松散化和价值生成浅层化等现实问题，导致作用机制运行受阻，数字技术优势尚未充分转化为实践育人优势。

4.1. 资源开发碎片化：红色资源数字转化效能不足

地方红色资源是“行走的思政课”的重要内容基础，但资源优势并不必然转化为育人优势。一方面，地方红色资源涉及历史文献、革命遗址、人物事迹、文化符号等多种类型，不同资源主体之间缺乏统一规划和有效整合，数字资源呈现一定程度的碎片化特征；另一方面，部分数字化建设侧重资源展示和信息存储，关注“资源数字化”多于“资源教育化”，导致红色资源与课程教学、实践活动之间衔接不足。

造成资源开发碎片化的根源，在于数字化建设与实践育人需求之间尚未形成有效联动。红色资源数字化并非简单的技术转换过程，而需要围绕教育目标进行资源筛选、内容重构和价值阐释。如果缺少课程思维和育人导向，数字资源容易停留于历史资料呈现层面，难以转化为具有教学价值和实践意义的教育资源。

此外，资源数字化过程中还需要警惕“重数量、轻质量”的建设倾向。单纯扩大数字资源规模并不能直接提升育人成效，若忽视红色资源背后的历史逻辑、精神内涵和价值意义，可能造成红色资源由“价值载体”弱化为“信息素材”。

4.2. 情境体验表层化：数字技术与价值体验融合不足

情境体验是实践育人发挥思想引领作用的重要载体。不少实践教学虽然引入数字展示、沉浸体验等数字化手段，但数字技术更多停留于教学形式创新，尚未有效融入实践教学全过程，情境体验的育人功能未能充分释放。

在实践教学中，过于强调视觉呈现和技术展示，缺乏围绕实践主题组织的问题探究、互动交流和反思总结，学习者更多停留于参观体验和获取信息层面，对革命历史和红色文化的理解缺乏深度，实践体

验难以进一步转化为思想认同。同时，部分数字内容存在娱乐化、同质化倾向，弱化了红色资源应有的思想教育价值。情境体验表层化使数字情境与价值引导之间缺乏有效贯通，情境体验机制难以充分发挥促进思想认同和价值塑造的作用。

因此，数字化情境建设需要防止技术逻辑对教育逻辑的替代。过度追求交互效果和视觉冲击，可能使实践教学陷入“技术赋能表象化”，出现体验增强而价值深化不足的现象。数字技术的应用价值不在于创造更加复杂的展示形式，而在于促进学生在情境体验中深化历史理解和价值认识。

4.3. 主体协同松散化：多元主体协同机制尚未完善

协同育人机制依赖不同主体之间形成稳定、高效的合作关系。“行走的思政课”涉及实地调研、资源整合、安全保障等诸多复杂环节，需要多方协同配合[7]。然而，当前数字化赋能“行走的思政课”实践育人仍以马克思主义学院或思政课教师个人的力量推动为主，多元主体协同程度不足，资源整合和协同运行机制尚未真正建立。

实践教学涉及地方红色资源管理部门、教育机构、纪念馆、博物馆以及社会组织等多个主体，但现实中各主体之间合作更多集中于实践活动组织，在资源共建、课程开发、实践指导、成果评价等方面缺乏制度化合作机制。数字平台虽然提高了信息共享效率，但跨主体资源整合和协同管理功能尚未充分发挥，不同主体之间仍存在职责边界模糊、协同动力不足等问题。主体协同松散化削弱了数字平台的组织优势，影响实践育人各环节的有效衔接，协同育人机制难以形成持续稳定的运行合力。

同时，数字平台建设过程中也需要关注平台化带来的治理风险。若数字平台仅作为资源展示和信息发布工具，而未形成主体互动和协同育人的运行机制，容易导致数字化建设停留于技术连接层面，无法真正推动育人主体关系重构。

4.4. 价值生成浅层化：实践体验向价值认同转化不足

价值生成是数字化赋能实践育人的最终目标，也是作用机制有效运行的重要体现。当前，实践教学更加关注活动开展和过程管理，对学习价值形成的持续关注相对不足，实践体验尚未充分转化为稳定的价值认同。

实践教学仍以实践参与情况、成果展示或实践报告作为主要评价依据，对学习理论深化、思想变化和行为养成缺乏持续跟踪，实践活动结束后价值引导随之中断。同时，数字平台积累的大量学习数据更多服务于教学管理，对学习过程分析、成长诊断和精准引导的应用不足，数字评价优势尚未真正转化为育人优势。价值生成浅层化表明，数字化赋能实践育人尚未形成贯穿实践准备、实践实施和实践反思全过程的价值引导机制，实践体验难以持续转化为价值认同和行动自觉，实践育人成效仍有进一步提升空间。

与此同时，数字传播环境中的流量逻辑和娱乐化倾向也可能影响红色资源价值表达。红色文化传播需要坚持价值引领，如果过度迎合传播规律而削弱历史深度和精神内涵，可能造成红色资源传播形式丰富但价值感染不足。

5. 数字化赋能“行走的思政课”实践育人作用机制的优化进阶

数字化赋能“行走的思政课”实践育人的关键，在于推动数字技术优势转化为实践育人效能。针对当前资源转化不足、情境体验表层化、主体协同不充分以及价值生成不深入等现实困境，需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遵循，围绕资源转化、情境体验、协同育人和价值生成四个关键环节，完善数字化赋能实践育人的运行机制，实现地方红色资源、数字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融合。

5.1. 完善资源转化机制，提升红色资源育人效能

资源转化机制的有效运行，有赖于地方红色资源持续、稳定地转化为实践教学资源。破解资源开发碎片化问题，应立足实践育人需求，推动地方红色资源数字化建设由资源保存向教育化开发、课程化建设和实践化应用延伸，不断增强资源供给与实践教学之间的契合度。

一方面，加强红色资源数字化统筹开发。依托地方红色资源禀赋，对革命遗址、历史文献、人物事迹、口述资料等进行系统梳理和分类整合，建立多主体参与、动态更新、开放共享的数字资源体系，提升红色资源数字开发的整体性和规范性。避免不同主体各自建设、资源重复开发等问题，实现区域红色资源的集聚利用。

另一方面，强化红色资源的教育转化能力。数字化开发应超越单纯的信息采集和技术展示，围绕思政课程目标和学生认知特点，对红色资源进行主题化组织、课程化设计和情境化呈现，推动历史资源转化为教学内容、实践素材和价值载体。通过资源开发与教学需求的有效衔接，使地方红色资源真正成为“行走的思政课”的重要支撑。

同时，应警惕数字化建设中的形式化倾向。红色资源数字化的价值并不在于数字资源数量的增加或技术形式的丰富，而在于能否通过数字技术深化历史理解、强化价值认同。只有坚持教育逻辑优先，才能避免红色资源由具有精神内涵的育人资源异化为一般性信息资源。

5.2. 优化情境体验机制，促进数字技术与价值体验融合

情境体验机制优化的重点，在于推动数字技术与实践教学深度融合，使数字情境真正服务于理论学习和价值塑造。数字实践情境建设在充分释放技术赋能优势的同时，必须恪守思想政治教育内在规律。

首先，应推动数字技术与实践教学过程融合。围绕地方红色资源的历史背景、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合理运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数字叙事等技术手段，将抽象的历史知识、静态的文化资源转化为具有互动性和体验性的教学情境。同时，避免将数字技术简单等同于教学创新，防止技术展示取代思想引导。

其次，应完善“体验－认知－反思－认同”的实践教学链条。数字情境能够增强学生对历史场景的直观感受，但价值认同的形成需要建立在深入思考和意义建构基础之上。应将数字体验与课堂讨论、社会调查、实践研学、成果展示等环节相结合，引导学生在体验历史、理解历史和反思现实中深化价值认识。

此外，应处理好技术沉浸与价值深化之间的关系。数字技术具有增强体验真实性和互动性的优势，但过度追求视觉效果和技术呈现，可能造成“重体验、轻思考”的问题。因此，应始终坚持技术服务育人的原则，使数字情境成为促进思想交流和价值生成的重要媒介，而非单纯的展示工具。

5.3. 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凝聚多元主体育人合力

协同育人机制运行的关键是要促进不同育人主体之间形成稳定、高效的协作关系，实现资源开发、课程建设、实践组织和成果评价协同推进。破解主体协同松散化问题，应坚持系统观念，完善多元主体协同运行体系，不断增强实践育人的整体效能。

一方面，构建多主体协同运行机制。学校应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优势和课程建设优势，加强实践教学设计和价值引领；地方红色场馆和文化机构应发挥资源供给和实践平台优势，参与教学内容开发；技术平台应提供数字化支撑，促进资源共享和信息互通。通过明确主体职责，实现资源共建、课程共研、实践共育。

另一方面，完善数字平台协同功能。数字平台不应局限于资源展示和信息传播，而应成为连接教育主体、整合实践资源、促进教学互动的重要载体。通过建立资源共享、过程记录、反馈评价等功能体系，

推动实践育人由单向供给向多元互动转变。

同时，应加强数字化协同治理，避免平台建设陷入“重技术投入、轻机制运行”的困境。数字平台只有嵌入实践育人体系，才能真正发挥连接主体、整合资源和优化过程的作用，实现技术赋能与主体协同的统一。

5.4. 强化价值生成机制，推动实践体验向价值认同转化

价值生成是数字化赋能“行走的思政课”实践育人的根本目标。提升价值生成机制运行效能，应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价值塑造贯穿实践教学全过程，推动理论学习、实践体验和行为养成有机统一，不断增强实践育人的思想引领力。

首先，强化全过程价值引导。将价值塑造贯穿实践活动全过程，在实践前加强理论准备和问题导入，在实践中强化情境体验和交流互动，在实践后注重总结反思和成果转化，引导学生从了解红色历史走向理解精神内涵，从情感触动走向价值认同。

其次，完善数字化评价机制。实践育人成效不能简单通过访问量、参与度、互动次数等技术指标衡量，而应关注学生知识理解、情感变化、价值认同和行为表现等深层维度。通过建立多元评价体系，推动数字技术更好服务于育人成效评估。

最后，加强数字传播价值引导。面对数字传播环境中的流量逻辑和娱乐化倾向，应坚持红色资源传播的真实性、严肃性和教育性，避免红色文化被简单符号化、消费化。通过强化价值规范和数字治理，使数字传播成为深化红色文化认同的重要路径。

基金项目

本文系淮安大学 2026 年度校一般课题“地方红色资源数字化赋能‘行走的思政课’实践育人机制研究”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 [1] 姜长宝, 任俊霞. 红色资源赋能高校思政课教学: 可为、应为、难为与何为[J]. 中国大学教学, 2024(3): 40-46.
- [2] 孙大东, 赵宇. 红色档案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现实困境与纾困策略[J]. 浙江档案, 2024(5): 21-25.
- [3] 董少校. 行走的思政课: 价值意蕴、实践进路与优化策略[J]. 中国高等教育, 2024(20): 56-59.
- [4] 王江伟, 井政皓.“行走的思政课”: 社会实践形塑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内在逻辑及其优化机制——基于高校共青团组织“三下乡”活动的多案例分析[J]. 青年发展论坛, 2024, 34(4): 40-49.
- [5] 葛照金, 李娟. 超越技术理性: 红色资源数智化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境遇、机理与进路[J]. 湖南社会科学, 2026(3): 110-116.
- [6] 胡飒, 秦梦琪.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三重向度[J]. 思想教育研究, 2025(10): 51-57.
- [7] 曾令辉. “行走的思政课”教学规范化建设面临主要问题的思考[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5(10): 115-122.